

如果討論「一帶一路」倡議時只聚焦在經濟，這便是完全忽略了這件事情對於未來世界的意義。

今天我們身處的社會，源於歐洲工業革命以來的世界格局。以西歐文明為主導的國家，首先步入發達經濟和先進文化，並隨著西班牙、葡萄牙、英國和美國的先後強大，而構建了今天的國際秩序，以西方文明為核心和進步的象徵，其他地方向著這套文化學習和仿效。

「一帶一路」的重要之處，在於除了這個已有的世界之外，提出構建一個更加多元化的國際文明，這是代表著未來。可以說，「一帶一路」倡議既有新的，也有舊的一面。新，在於提出從根本改變現有的單極文明世界，讓在現有國際秩序中處於被忽略和劣勢的民族、社會、地區和國家有機會登上國際舞台。舊，是因為在歷史上，這些地區也曾經有過非常光輝的文明，甚至是當時的世界中心；古絲綢之路其實就是當時繁榮盛世的結果和象徵，「一帶一路」就是復興舊有的文明。

任何人與人的交流，經貿往還都是最原始的推動力；古絲綢之路如是，西歐的海洋文明也如是。「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基礎落後，所以如果要恢復和實現亞歐非大陸的人文交往，便需要從經貿交流開始。可是這些地方實在連前往當地也存在困難，所以便要先通路搭橋，做好基建，做到互聯互通，讓人們能夠有交往和經貿的可能性。

所以「一帶一路」只是手段，先追求共同繁榮和共富，最終目的是整片亞歐非大陸的人文交往，從而構建人類的多元世界文明。而其中改變今天的既有國際秩序，則是一件副產品。

「一帶一路」倡議的經濟關係固然重要，但整項倡議的含義其實要遠遠深層和寬闊得多。「一帶一路」充滿著中國人開放、包容和彈性的東方智慧，這不同於過去例如自由貿易協定等的具體法律政策，更像一套促進各國關係的「組合拳」，當中除包含自由貿易，還有人員流動、文化交流、基礎建設、協同發展和互聯互通等等，將對未來的國際格局帶來深遠影響。

在這套組合拳中，簡單總結起來有四個層面：第一，協調各國發展策略對接，做到政策協同，使所有參與國家之間的發展事半功倍。例如蒙古國所提出的「草原之路」發展項目，以及哈薩克斯坦的「光明大道」計劃，都能夠很好地和「一帶一路」的內容結合起來。

第二，是涵蓋著文化、民間、社會團體、人文等多層次的交流融合，讓大家增進瞭解、建立友誼。在習近平主席2015年訪問英國時揭幕並廣受關注的英國孔子學院，便是出於這個目的而成立的。

第三，是具體的基建項目，例如興建高鐵、公路網、天然資源輸送管道等，並同時設立了絲路基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等平台作為支撐。這一項是「一帶一路」的核心載體。

第四，是整個倡議的最終目標，即達至各國和人民的商貿往還、相互投資和共同繁榮。又因為「一帶一路」中的不少國家仍然是發展中國家，所以「一帶一路」的發展，對當中所包含龐大人口的脫貧問題有著重要意義；而中國在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的成功，讓七億人口脫貧的經驗，具有十分積極的分享價值。

「一帶一路」所倡議的內容很豐富，結合了多位學者的長期主張。按照中國外交部亞非協會理事曹辛的說法，其中便包括了國際關係學家王緝思教授的「西進」建議、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主張的對外投資、林毅夫教授的利用外匯進行投資，以至新加坡華人學者鄭永年教授主張的向海外發展中地區進行資本輸出等等想法。由此可見，「一帶一路」既是內涵眾多的組合拳，更可以看到學者對中國決策層的巨大影響力和政府對研究的高度重視。

「一帶一路」的構想，最早可能源於王緝思在2012年提出的「西進」戰略構想。他認為中國在東面跟美、日維持「競爭」的同時，更應大力「西進」，進入中國外交傳統上的非重點區域。這種思想，實際上體現出他對陸權與海權並行不悖的觀點，也為日後完善「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原始土壤。

在結合具體經濟和投資活動上，吳敬璉的主張在這裡結合起來了。他認為只通過投資拉動國內增長，已經幾乎沒有出路。只有向國外投資，才能避免產能過剩、資源浪費、房價高企、地方債務等困擾當前中國的經濟問題，同時增加外匯儲備。

同時，林毅夫和鄭永年兩位學者認為應該將中亞等發展中地區，培育成中國潛在的資本輸出市場。也是在2012年，林毅夫就曾向中央建言，中國可以汲取美國的經驗，進行資本輸出和購買資源，以自己雄厚的外匯儲備，收購外國資源、投資國外基礎設施。至於鄭永年也認為，中國在通過向中亞地區投資，促進當地經濟發展和培育當地成為新興市場之後，將能促進中國產品的銷售，也可以吸引那些

國家向中國借貸。同時，這片幅員遼闊的發展中地區的人口結構非常年輕，發展潛力因而非常巨大。

一切緣起於學術討論，再由被譽為習近平首席財經智囊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劉鶴主任集大成，最後成為「一帶一路」倡議。

對於「絲綢之路經濟帶」，其作用是聯通中國西部和亞歐大陸，以促進西部和這些地區的共同發展。

眾所周知，唐朝是絲綢之路貿易最鼎盛的時期，作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位處中國西部的唐朝首都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具規模的城市。其主要原因，源於當時整個社會和發展中心，由中國西部開始，形成一個橫跨亞歐的「大陸文明」。當時中國西部和中原地區的發展程度遠高於東南沿海，文化和政治等中心均集中在這些發達地區。

後來，「大陸文明」隨著「海洋文明」的冒起而衰落，近代西方航海事業和國際航運的發展，促使大量交往通過海路進行。海路逐漸取代陸路，成為人類國際交往和貿易活動的最主要通道。當代中國逐漸融入既有的世界體系，「海洋文明」也主導著中國近代的發展，形成東部沿海地區的發達局面。

要讓西部發展，只依靠內部聯通並不足夠，同時推動大陸文明的復興是必不可少的。今天「一帶一路」要達到的，是促進中國西部整個亞歐大陸的發展，重新激發起整個地區的經貿和人文活動，這對西部大開發的意義不言而喻。如此，幅員遼闊的亞歐大陸國家勢必發展起來，相輔相成，從而促進中國西部的發展。沒有「大陸文明」的基礎，中國西部的發展也不會牢固。同時，恢復大陸文明對於整個中華文明的復興也是意義重大。這樣中國便能夠從一個相對還是被動的海洋文明，變成兼具東部海洋和西部大陸文明的體系。

所以說「一帶一路」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計劃，更加是促進文明復興的宏大想法。中華民族起源於黃河河套地

區，至秦朝和唐朝因為地處西邊，自然把重心移至西部，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古長安城能夠成為多朝古都。及至明清，已將都城從西安移至地處東邊的北京或南京。

東部之所以會逐步取代西部成為中國的發展重心，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隨著全球海洋文明的崛起，中國也受到了影響。中國東部經歷的戰爭比較少，能夠享受到相對和平的環境，以致經濟發達和社會穩定。這一點在當代也能找到例子說明，例如上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流行文化和今天的「韓流」等次文化，都是香港和韓國相對平穩的社會環境和富裕的經濟條件所促成的。文明重心的轉移，充分體現出物質條件，包括科技水平和活動空間等，對於文明興起的促進作用。

所以在看待「一帶一路」時，如果只看到經貿而忽略背後所帶來的地緣和文明格局的變化，便沒法完整明白「一帶一路」的意義和影響；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倡議當中除了經貿發展，更經常強調文化交流和人文交往的重要性。

「一帶一路」是中國新一輪改革開放的其中一個重要標誌。在這一輪進程當中，中國將會實施更加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並建設一個全方位開放型的經濟體系。

中央政府經常稱二十一世紀的頭二十年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那麼什麼是「戰略機遇期」呢？這就是說對於中國全國的發展來說，一個從過去的量變（經濟體量增大），到實現質變（生產能力、經濟結構等因素發生變化）的過程，最後變成一個強大而健康的成熟經濟體。就有點像人類踏入青春期，從少兒過渡到成人的階段一樣，非常關鍵。

「十三五規劃」就是在這樣的經濟背景下提出的。「戰略機遇期」有二十年，而現在已經進入到最後的五年。在完成「十三五規劃」（2016-2020年第十三個五年經濟規劃）時，中國的目標便是要成為一個「小康社會」之國。因此，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不但是目標，更是衡量「十三五規劃」和「戰略機遇期」發展是否成功的標準。

正因如此，在剛結束的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關於「十三五規劃」的建議文件當中，便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五個發展理念，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行動綱領；而各項理念，均有配套的政策措施。例如「一帶一路」倡議，便是對應中國更加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使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全方位開放型的經濟體系。

這背後所追求的，更是一種全面和平衡的發展理念。

「一帶一路」倡議反映著中國與西方對發展模式截然不同的思路。這除了對發展手段和路徑有重大影響之外，對如何構建，以及構建什麼樣的國際秩序，也將帶來深刻影響。

美國著名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的一篇文章題目為《絲綢之路，中國向世界發出新的公開收購》的文章指出，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在2016年進一步實施，一場歷史性競賽將在兩種相互競爭的發展模式之間展開。一方是中國，另一方則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而競賽的結果，將決定歐亞地區未來數十年的前途。福山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同於西方國家，更多是建基於國家對基礎設施（鐵路、公路、港口、電子機場網絡等等）的大規模投資，進而為工業發展提供便利條件。中國通過基礎設施發展的戰略而取得成功的經驗，已經為一些東亞國家所跟從，成為這些國家發展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一帶一路」倡議能夠取得成功，那麼日後整個歐亞大陸將在今後一代人的時間裡得到改變。中國模式將在中國之外得到廣泛認同，也為中國尋覓得更廣闊的市場。中亞將不再是全球經濟的邊緣地帶，而是未來世界的中心。

任何一個世界性大國，都有一套屬於自己的國際體系。所以這實際上又是中美兩國全球化模式的博弈：美國站於現在，基於現有國際規則，強化現有國際格局的參與者。至於中國則面向未來，提出另一套國際規則，增加了很多個在現有國際格局下被邊緣化的參與者。誠如福山提出的風險問題，中國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發展，需要穩定的政治環境。這種模式在中國國內運作良好，受益於中國政府有能力控制政治環境；可是國外的情

況可能不盡相同。整片地區的不穩定、衝突和腐敗問題，都可能干擾其進展情況。另外，美國和西方國家也不大可能袖手旁觀，讓歐亞大陸和世界其他部分地區的前途跟隨中國的發展模式。

中國和西方提出兩種不同的模式，跟各自的歷史和文化淵源有深刻關係。「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邁向全球化的初始階段，也是中國首次把自己的發展理念實踐到國際關係當中。

	中國模式	美國模式
背景	源於歷史上的大陸文明，例如「古絲綢之路」的黃金時代。	西方文藝復興背景下的海洋文明
方法	以國家投資基礎建設，拉動工業化。	投資自由化，以「華爾街模式」和「美元本位」為代表。
主要缺陷	政治風險	「南北困境」：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的差距。
意識形態	不強調。建基於十八屆五中全會五個發展理念當中的協調、開放和共用。	肩負西方文化有帶領其他落後地區進步的責任，源於基督教文化的傳播精神。
現階段發展重點	強調基礎建設，「互聯互通」。	各國的生產鏈融合
手段	重視貧窮落後國家，複製自身脫貧經驗，提倡「一帶一路」。	鞏固現有國際格局，例如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